

学林

◀ (上接 5 版)

之誉的严复试图将实证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结合起来。他明确提出知识(理)的本质是“知象相符”。“知”即人的认识能力,“象”即现象。换种说法,“人之知识,止于意验相符”。这是赫胥黎在《天演论》中的话,严复表示同意,并且将之与庄子所说的“心止于符”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严复用庄子的“心止于符”来衔接实证主义认识论的知识即“意验相符”的观点,从而显示出了沟通古今中西的努力。

在认识的内在机制上,经受了实证主义认识论洗礼之后的严复坚决反对中国传统认识论在认识对象上的“师心自用”和文辞化,即将文本作为研究对象。严复认为,正确的做法是面向外在世界直接发问,“读无字之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早在 1906 年,严复便明确提出“科学之中,大有感情”的观点,石破天惊,但以往的研究往往对此视而不见。在严复的理路中,这个观点之所以能够成立,主要缘于实证主义本身的内在吊诡:它会发生从客观主义到主观主义的转变;也因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深刻影响,此又表现为对人心的复杂性的认识和科学的道化。通过重审严复的这个观点,我们可以对中国现代认识论的基本品格以及实证主义在中国的浪漫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作重新的评估。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高度重视心理建设,严厉批评宋明理学以来的“行难知易”思想,在认识论上提出了“孙文学说”,主张知难行易。学界一般总将“孙文学说”(知难行易)理解为一个问题: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事实上,它包含着两个观点:第一,强调实践的重要性;第二,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实际上他在主张某种形式的“知行合一”。同时,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作为文本的“孙文学说”是复杂的,它不仅包含以上两个基本观点,而且,分析

其中著名的造钱、饮食、建筑等十个事例,至少从六个方面揭示认识的环节或者认识论的可能维度:

1.“行先知后”意义上的“知难行易”。就是说,因为有些事情先有行再有理论,行在知前,所以“知难行易”。

2.“知为行导”意义上的“知难行易”。它说的是,对于有些事情,人们早已在实践,但效果不好,问题出在没有掌握好的理论。由原先实践的效果不好来说明理论获得之难。所以也是“知难行易”。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掌握了好的理论,实践起来就可以更容易。

3.“知后须行”意义上的“知难行易”。它说的是,对于有些事情,人们掌握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但依然没有好的效果,其问题出在不敢实践。通过提倡“知难行易”来鼓励中国人去实践。此时,“知难行易”更多的是一种规范性判断,起到的是鼓励作用。

4.“行为知始”意义上的“知难行易”。就是说,对于有些事情,人们还没有任何理论,但是,通过实践可以逐渐掌握其理论。它和“1”有点接近,但是,“1”只是说明了知行的先后关系,并没有对行是否会产生知作出判断。“4”却对此做出了肯定。

5.“默会知识”意义上的“知难行易”。它的意思是说,有些事情人们已经在实践了,可是却很难在理论上阐明其理论。这不是说实践的深度广度等等不够,也不是说人们不聪明,而是由这些实践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它们本质上属于较强的默会知识,只可意会不能言传。

6.“知多行少”意义上的“知难行易”。这句话比较费解。它说的是孙中山所举的例子其实是以实践所需要的知识的多寡来判断知和行孰难孰易。不过很显然这种说法比较不严格,但也聊备一说。

不容否认的是,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对“知难行易”的含混表述的确给读者理解他的

思想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仅仅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孙文学说包含了丰富的认识论思想发展的契机,其价值不可低估。

辛亥革命时期另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是章太炎。在较长的时段内考察章太炎的认识论思想,应该说他的地位相当特殊。在专业化的哲学家比如金岳霖、张东荪系统地讨论认识论问题之前,章氏可谓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讨论认识论问题比较深入的一位。这种深入性,和他对以繁复为长的唯识学的汲取是分不开的。章氏借助唯识学、西方哲学(主要是康德思想)建立起真如哲学体系之后,他便以之衡量先秦诸子之思,从而对诸多古典范畴、命题做出了新解。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做法实质上也是借助新的机缘促发了先秦思想的生命力。总的看来,章太炎对认识论的获得机制本身、对人的认识能力、真理问题、科学规律问题等,都提出了独到的看法。

问题在于,章太炎从其坚持的佛学立场出发,认为真理根本上是人的多种认识能力建构出来的,本身并无实性。其实也就意味着面对着这个现实的世界,我们不必予以具体的探究,而只需像阿 Q 那样转换眼光即可。无疑,此时真理极易流为虚幻之物。

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的认识论思想

历史进入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在认识论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梁漱溟可谓现代新儒家第一人。他较早登上思想史舞台。他认为中国先秦以来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在认识论领域的基本特色就是高度推崇“理性”。但这种理性是特殊的,本质上是直觉锐、情感厚:“西洋人之所谓理性,当然也是平静通晓,但是只差‘而有情’三个字;中国人的理性,就是多‘而有情’三个字。”在西洋有法国人的“唯理主义”,这都是从极冷静处得来的,已把情感排出去了。

梁漱溟认为,将理性情感化源于周孔教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性是野蛮的、粗陋的、神秘的。他认为,理性从其内在特征来讲,也是包含了反省的维度。这可以看做是对儒家所说的“内自讼”传统的继承,也可以说是受了现代西方理性思想强调反省的影响。



梁漱溟

“中国人的理性,就是多‘而有情’三个字。”

自由就是正确地认识世界



冯友兰



熊十力

提出了比量和证量两种认识论进路

无言、少言
玄思



贺麟

也许,认识论上的薄弱是现代新儒家的一贯特色。这点也体现在其他人物那里。熊十力写作了多种本的《新唯识论》,建立了其本体论。他多次表达了要写作知识论著作即《量论》的愿望,但始终没有成文。从这个角度看,熊十力似乎没有认识论思想。但显然这种论断是错误的。事实上,在其晚年的重要著作《原儒》中,他紧密地结合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的认识论思想,对其整个认识论规划进行了扼要的表述,提出了比量和证量两种认识论进路,从而凸显了知识型和智慧型两种认识论。

在下面的言论中,熊十力将两种认识论和先秦诸子联系起来了。他说:

《新论》救后儒之弊,尊性智,而未尝遗量智;(量智,即理智之异名。性智是体,量智是用。量智推度,其效能有限。以其不得有证量也。存养性智,是孟子所谓立大本之道,陆王有见乎此。然未免轻知识,则遗量智矣。孟子尊思为心。心者,言乎性智也;思者,言乎量智也。遗量智,则废心之官。后儒思辨之用未宏,此《新论》所戒也。)归乎证量,而始终尚思辨。(证量者,性智之自明自了。思辨,则量智也。学不至于证,则思辨可以习于支离,而迷其本。学唯求证,而不务思辨,则后儒高言体认,而终缺乏圣人智周万物、道济天下之大用。无可为后儒诤也。……)性智,即仁体也;证量,即由不为仁,而后得此也。((《十力语要》))

熊十力批评宋明儒学重视性智而忽略量智,他认为在孟子那里性智(心)和量智(思)都

得到了重视,并且将性智和儒家之仁等同起来。先秦之思具有更大的圆满性。

另外我们也可以发现,熊十力立足于儒家此点不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先秦儒家是完美无缺的。他认为佛家在“克己”的内在向度的问题上比儒家要细致。这可以看作熊十力援佛入儒、丰富儒学的内涵的努力。

创造了“新理学”哲学体系的冯友兰在道德哲学上显然独具特色,但在认识论上如何,则需要专门的考察。

在“新理学”中,人生境界得以逐步提升的机制是对自身在世界上的位置的认识。如果仅仅把世界理解成自己本身,那么所得只是自然境界或者功利境界;把世界理解成社会,所得就是道德境界;把世界理解成宇宙,所得就是天地境界。可见,每一种境界都是以对世界的某种认识为前提。冯友兰以“觉解”来表示这种认识。和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建立“新理学”时期的冯友兰并未赋予广义的实践以充分的地位。实践并未成为检验境界的标准。实践只是境界得以展开的领域。

解放后,冯友兰较快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并开始自觉用马克思主义来诠释中国哲学史。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自由就是正确地认识世界,然后在此基础上成功改变世界。这点充分地体现在他对《韩非子》的解释中。他认为,韩非子特别强调“理”作为一个哲学范畴的重要地位。《韩非子》



严复

“科学之中,大有感情”

真理本身并无实性



章太炎